

闽东方言北片区语音研究回顾与前瞻

任翔宇

(宁德师范学院 语言与文化学院,福建 宁德 352000)

摘要:闽东方言北片区的四种历史方言文献,记录了自 18 世纪中叶以来福安话的语音状况,半元音声母的产生、辅音韵尾的混并、撮口呼的存在以及变韵等现象,都能从中寻找到线索。方言调查与研究的深入,使闽东方言北片区的声母类化、变韵等现象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而现代音系学、历史层次分析法的引入,则使其复杂的音变现象得到了合理的解释。未来的语音研究需要对历史语料进行深入挖掘,对活语言进行更为细致的调查,对闽东方言北片区复杂的方言接触给予更多关注。另外,将方言与戏曲等民俗文化形式相结合进行研究,也是拓展闽东北片方言研究领域的途径之一。

关键词:闽东方言;北片区;语音研究;现状;前景

分类号:H17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395 (2019)01—0084—05

闽语是内部复杂程度最高的汉语方言之一,闽东方言则是闽语的五个次方言之一,大约于唐末形成,可分为南北两片。南片以福州话为代表,北片以福安话为代表。闽东方言北片区的范围,大致与今天的宁德市相当。

闽东南片方言的研究已经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而北片方言的研究则相对较为薄弱。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主要有两个。首先是研究材料的匮乏。南片区有明代韵书《戚林八音》以及明清以来许多儒生的方言文献作为参照,此外还有大量的传教士文献可资研究,而目前已知的福安方言历史文献仅有四种,这给历史语音研究带来了很大的不便。其次,闽东北片各县市的地理位置较为偏僻,因此,有关其活语言的调查尚不够全面深入。

近年来,闽东方言北片区的交通条件得到了改善,一批学者把目光投向此地。他们尽力搜集文献语料,拟测闽东北片方言的历史语音面貌,同时不避艰辛,深入北片区各重要方言点进行田野调查。在此背景下,新语料、新观点不断涌现,产生了一批具有重要意义的研究成果。以下,我们仅就学界相关研究语音方面的成果做一梳理,并对闽东方言北片

区语音研究的前景做出展望。行文如有疏漏处,敬请学界同仁批评指正。

一、闽东方言北片区文献语料研究现状

目前已经搜集到的闽东北片方言文献仅有四种:残卷本《戚林八音福安地方方言版》《安腔戚林八音》《班华字典》《简易识字七音字汇》。除《班华字典》外,其余三部作品均为本地儒生所著,在内容和体例上受明代福州方言韵书《戚林八音》的影响很大。至于《残卷》与《七音字汇》的研究,因往往夹杂在学者对另外两本方言文献的研究之中,因此不再单列论述。

(一)《安腔戚林八音》研究

《安腔戚林八音》,又名《陆琼园本腔八音》。《福安市志》记载其作者为陆求藻(字琼园),清代福安鹿斗人氏,曾经参与校定福安县志(1783 年)。现今收藏于福安市图书馆的《安腔戚林八音》系陈祖蔚 1953 年的手抄本,共七卷。陈祖蔚称,该书由他的祖父陈登昆与其师陆尚琳二人合著。由是推断,《安腔戚林八音》可能有不同版本以及不同著者。吴姗姗、马重奇认为,目前所见的陈氏手抄本《安腔戚林

收稿日期:2018-10-1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班华字典》与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闽东方言”(17XY009)

作者简介:任翔宇(1980—),男,陕西汉中,人,讲师,博士,主要从事汉语史和汉语方言研究。

八音》中多处出现的所谓“老本”“旧本”“原本”“古本”,可能便是指陆求藻于18世纪所编的《安腔戚林八音》。吴姗姗根据《安腔戚林八音》的韵字释义以及作者所作文提示,剥离出《安腔戚林八音》的老本与抄本音系并进行比较。比较结果显示:老本与抄本音系相差较大。老本当中,“无”母的性质稳定,“杯、辉、须”三韵未出现混并;中古三套辅音韵尾保留完好;有五个撮口呼韵母。而抄本音系与老本有较大差异,“兼具早期福安话和现代福安话的特点”^[1]。

对《安腔戚林八音》的音系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肇始于马重奇师与杨碧珠。马重奇发现,有别于闽语的“十五音”系统,《安腔戚林八音》多出了“如”“无”两个声母。他认为,这两个声母的存在,可能是受到吴语温州话的影响所致。杨碧珠的观点与此相近:在韵母上,《安腔戚林八音》仍然保留中古三套辅音韵尾的对立;但是,三种鼻音韵尾已经出现混并,四种入声韵尾(含喉塞尾)也已出现混并。

吴姗姗、马重奇对《戚林八音福安地方方言版》(残卷)与《安腔戚林八音》进行了比较。比较结果显示,《残卷》与《安腔戚林八音》的韵系有显著差异。具体表现为:第一,《残卷》的三套辅音韵尾排列整齐界限清晰,而抄本《安腔戚林八音》则相反;第二,《残卷》中的秋韵、烧韵严格对立,而《安腔戚林八音》的抄本已有混同;第三,止撮合口的三等韵字在《残卷》属“杯”韵,而在新本《安腔戚林八音》中,分属“杯”“须”两韵;第四,《残卷》中杯、辉二韵次序井然,抄本《安腔戚林八音》中的杯、辉、歪三韵则多有相混。综合韵书内部证据与史料线索,吴、马二人推断:“《安腔戚林八音》老本成书时间在18世纪中、末叶,《残卷》成书时间应该也在18世纪中、末叶,最迟在19世纪初。”^[2]

戴黎刚的研究结果与马、吴二人大致相同,他也认为《安腔戚林八音》的“杯”和“辉”,应是同一个韵母;清末福安话的三套鼻塞韵尾并为两套。特别之处在于,戴黎刚认为,清末福安话应该有撮口呼的音类。这与下文将要提到的秋谷裕幸的观点相近,而与吴姗姗不同。

(二)《班华字典》研究

《班华字典》(*Diccionario Espanol-Chino, dialect de Fu-an*)是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记录福安话的一部大型词典,由清末西班牙来华传教士 Ignacio Ibanez 编写,前后耗时11年,于光绪十九年(1893年)完成,后来经过 Blas Cornejo 的修订,由

上海商务印书馆 Don Bosco 学院出版(1941—1943)。《班华字典》以西班牙语、福安话双语对照,用罗马字注音方式标注西班牙语词条在福安话中对应的词、短语或句子,并附以汉字,共1041页。秋谷裕幸、吴姗姗两位学者对其音系做过深入研究。

秋谷裕幸《〈班华字典—福安方言〉音系初探》一文,结合《班华字典》《简易识字七音字汇》,以及罗杰瑞和秋谷本人调查的福安方言,分析了《班华字典》的音系。声母方面,秋谷裕幸重点分析了j、w(前文所谓如、无)两个声母的由来。秋谷认为,这两个声母的存在,可能和调类差异、中古来源以及与之相配的韵母有关。^[3]从音系内部而不是从方言接触的角度着手探求如、无两母产生的原因,秋谷裕幸的研究为学界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思路。韵母方面,秋谷归纳出《班华字典》音系的一些显著特征:第一,三套辅音韵尾齐备并且有喉塞尾;第二,有撮口呼;第三,遇撮三等字和止撮合口字混并;第四,存在以上声为条件的韵母分化。

《班华字典》中是否存在撮口呼,学界尚有争议。《班华字典》的“序言”中,记录了传教士的注音与本土儒生郑宜光的音感并不一致这一事实。吴姗姗据此认为,《班华字典》中的撮口呼并无实质的音读意义,可能是来自福安城周边郊县的口音,在福安城中实际读为齐齿呼。而在辅音韵尾的问题上,吴姗姗认为,《班华字典》中尽管保留中古的三套辅音韵尾,但是这些辅音韵尾间已经发生混并,上声作为韵母变化的依存条件。这一研究结果,与叶太青、戴黎刚、陈泽平不同。一般认为,福安话的上声为非变韵调。所以,《班华字典》中的这一现象值得引起重视。

《戚林八音福安地方方言版》(残卷)、《安腔戚林八音》《班华字典》与《简易识字七音字汇》四部方言文献,为我们提供了18世纪中叶以来福安方言的语音线索。学界同仁通过精心梳理,已经对这二百多年间福安话的声韵调系统进行了归纳与拟测,对音系方面的突出特点做了重点分析,这为闽东北片方音史的构建做好了积极准备。实际上,前述学者的研究并不仅仅停留在方言文献内部音系的讨论,而总是下探至现代闽东方言,建立历时比较。下一节我们将对此展开论述。

二、闽东方言北片区现代方音的研究成果

(一)综合研究

钟逢帮的硕士论文《闽东方言北片音韵研究》通

通过对闽东方言北片区七个方言点的考察,概括出现代闽东北片方言的大体特征,认为在声母方面,北片区依然以“十五音”系统为基础,福安、周宁多出 j、w 两个半元音声母(《安腔戚林八音》所谓如、无),周宁话更多出一个齿间清擦音;全浊声母都已经清化,清化后送气与否,并不以平仄为作分化条件;韵母方面,闽东北片的韵母数量多在五十个以上,福安、福鼎两地没有撮口呼,其他各点则开、齐、合、撮俱全,北片各点均有鼻韵尾、塞音韵尾存留,但数量多寡不一。^[4]同时,钟逢帮也观察到了北片区同一韵母因声调不同而分为松、紧两套读法这一现象;但是,同沙平的观点一样,考虑到某些韵母在特殊调类上的重合对立,钟逢帮也没有将这种情况视为变韵,而是看作吴、闽两个方言区的一种过渡特色。

叶太青的博士学位论文《闽东北片方言语音研究》通过对六个方言点的调查以及对《简易识字七音字汇》的整理,归纳出闽东北片方言的音系特点,重点讨论了三套辅音韵尾的保存与消变以及北片区复杂的变韵现象,并且对闽东北片方言的分区划片提出了自己的新见解。^[5]叶太青的研究,让北片区一些重要的语音现象得到显现。例如,梁玉璋、沙平、钟逢帮均认为闽东北片方言不存在变韵现象,而闽东方言分为南、北两个片区的依据便是韵母是否以调类为条件分化为紧音与松音。叶太青的研究将北片区复杂的音韵现象揭示了出来,具有突破意义。

(二)福安方音研究

作为闽东北片方言的代表,福安话研究获得学界关注最多,成果也最丰富。近年来的研究,尤以陈泽平、戴黎刚的成果最为突出。二人分别运用现代音系学、历史比较法研究闽东北片方音,新方法的引入,将语音演变的阐释推向新的高度。

梁玉璋《福安方言概述》一文对福安方音的特点做了概括描述:第一,声母为 17 个,比“十五音”系统多出 j、w;第二,韵母不会以声调为条件改变音值;第三,未发现撮口呼韵母的存在;第四,连读时后音节会发生变调;第五,辅音韵尾简化为一套;第六,连读变声。^[6]

戴黎刚运用历史层次分析法,通过音系内部的比较后发现“福安话不但有变韵,而且比南片的方言更丰富和独特”^[7],并且总结出福安话变韵的四个特点:第一,变韵现象相当多见,除上声外,其余六个声调均有变韵,变韵和高低调没有关系;第二,凡韵腹是高元音的都要变韵,半高元音大多有变韵;第三,福安话的变韵格局在一百多年前的《安腔戚林八音》

时代便已成型;第四,某一些韵类的变韵并不彻底。

陈泽平则认为,变韵从逻辑上讲必然与声调有关,并提出了自己对变韵的一些观察:第一,变韵的过程并没有无限制进行;第二,变韵的音变过程可以观察到推链的存在,因此变韵的发生在调类、韵类上应有先后;第三,最先启动变韵的调类可能是阳去调;第四,变韵很可能先发生于权威方言点,进而影响附近方言。基于以上观察,陈泽平认为,研究变韵应该“对准权威方言点,在最先启动变韵的调类和元音类上下功夫”^[8],进而梳理出变韵在音类和地理上的扩散顺序。这篇文章另一个重要意义在于,将福安话的韵变分为两个阶段——变韵以及由变韵诱发的韵母系统的自我调节。韵系的自调节,是后变韵阶段的音变现象,与变韵的表现不同。这一论断,解决了一些用变韵无法解释的重合对立现象。此前的一些学者正是困惑于这种对立,才没有承认北片区变韵的存在。

福安话的如母与无母,是《安腔戚林八音》时代便存在的特殊声类,在现代福安话中的音值为半元音 j 和 w。对于这两个声母的由来,陈泽平和戴黎刚进行了深入研究。陈泽平认为:“福安话的两个半元音声母跟吴语温州话的 j 声母没有什么关系,也跟中古的次浊类声母没有直接的联系。”^[9]它们是从早期闽东语的零声母中分化出来的。由于变韵的影响,近代福安话的韵系曾经发生过剧烈变化,零声母音节变化滞后,为了保持对立,福安话的语音系统发生自我调节,增设两个半元音声母来收容变化滞后的零声母字,这是福安方言的独特创新。陈泽平与秋谷裕幸的思路相同,从音系内部寻找原因。而戴黎刚则从方言接触的角度寻找 j、w 的由来。他认为,j、w 的产生最初也是最重要的一步,是“日母、微母字受浙南闽南话的影响”^[10]。j、w 产生以后,由于福安话音系自调整以及方言调查者对音系的主观更改,福安话半元音声母完全音位化。

(三)宁德(蕉城)方言研究

宁德市辖区大致相当于闽东方言北片区(古田与屏南两县划归南片区),但是,因为行政区域沿革的影响,一些学者使用“宁德”一词时,往往只指宁德市蕉城区(过去为宁德县城关),并不包括福安市、霞浦县等地。我们以下谈到的几篇文章便是如此。

李延瑞、梁玉璋《宁德语音的近期演变及其途径》与沙平《福建省宁德方言同音字汇》均认为,宁德方言的急剧变化,主要表现为辅音韵尾的混并以及音值、调值的变化。沙平观察到了宁德话某些韵母

在特定调上缺字的现象,但是考虑到重合对立现象的存在,他并没有将其视为变韵现象。

陈丽冰、吴瑞文在《宁德方言的变韵及其历时意义》一文中,对宁德(蕉城)方言的变韵规律做出了概括,并进一步分析了变韵现象的历时意义。对于沙平观察到的某些韵类在特定调值上的重合对立现象,陈丽冰认为其原因是历史来源不同,故而没有参与同一时期的变韵过程。宁德话的变韵不仅有这种存古意义,还有可能在演变过程中促成韵母创新。陈丽冰的另一篇文章《福建宁德蕉城方言声母类化规律及其制约因素》对宁德蕉城方言的声母类化规律做出了概括,并且从一些例外的类化现象中发现,蕉城方言残留着早期三套辅音韵尾对连读下字的同化现象;最后,分析了语义等因素对声母类化的制约。^[11]从陈丽冰的研究可以看出,福安与蕉城两个重要的方言点在音变机制方面保持一致。

叶太青的《闽东方言宁德霍童话的变韵现象》《福建省宁德市洋中镇天湖话音系》两篇文章,归纳了蕉城区两个重要方言点的音系,并将其与福州话进行比较,发现了一些突出的语音特点,比如,霍童话的上声调为变韵调。这一点,即使在闽东北片方言内部也显得颇为独特。目前,我们只在秋谷裕幸对《班华字典》的研究中发现了这种现象。

(四)其他县(市)语音研究

相较于福安、宁德(蕉城)两地,闽东方言北片区的其他县市研究成果则较少。

戴黎刚《福建霞浦松城话的连续变韵》考察福建霞浦松城话后发现,松城话没有调类变韵,但是有连读变韵。部分韵腹是低元音a的韵母,作为连读前字,往往变为较高的元音,而且不以调类、语义、语法为条件。其他汉语方言尚未发现类似的变韵现象。温静与张晓琪的硕士学位论文分别调查了霞浦语音以及霞浦县闽南话方言岛的语音状况。

戴黎刚《早期福鼎话的两类撮口呼》是研究福鼎方音的一篇重要文章。现代福安、福鼎方言中没有撮口呼,但是戴黎刚通过不同范围的闽语比较,认为福鼎话存在过两种不同层次的撮口呼。李频华在福鼎市店下镇调查方言时,也发现了撮口呼的存在。福鼎地处闽东方言与浙南方言接触的前沿,因为移民的迁入又深受闽南话影响。这是未来闽东北片方言研究的重要区域。

柘荣、寿宁、周宁等地语音研究的成果,目前可见的有袁碧霞《柘荣话的文白读》、林寒生《寿宁方言的语音特点》和陈贵秀的硕士论文《闽东周宁县贡川

话语音研究》。有感于闽东北片区方言调查的薄弱,秋谷裕幸对福鼎(白琳镇)、霞浦(长春镇)、寿宁(斜滩镇)、柘荣(富溪镇)四地方言展开调查,并撰成《闽东区福宁片四县市方言音韵研究》一书,为深入研究闽东北片区语音,提供了比较系统的语音材料。

三、闽东方言北片区语音研究前景展望

(一)历史语料的发掘

闽东方言北片区目前可见的几种历史语料都是描写福安话的,这与福安话的历史地位相关。《残卷》等四种韵书的存在,可以大致描绘出18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的福安话音系。要了解闽东北片方音更早期时期的形态,有待于更多方言文献的发掘。历史语料的好处在于,可以对语言现象的产生时代准确定位。四种福安方言文献把闽东北片音系的研究上限提升到比《戚林八音》稍晚的时代,也让我们对“共同闽东语”分化的时间下限有了大致了解。因此,对于闽东北片方言文献的发掘,是众多研究者应该更多措意的。21世纪以来,这四种方言文献的发现都贡献了新的研究热点,都不同程度地加深了学界对闽东北片方言独特性的认识。

除了当地儒生编著的方言文献以外,西洋来华传教士所编写的方言材料也非常值得重视。《班华字典》的作者曾说过他借鉴了一本关于闽东北片方言的拉丁语文献,可见北片区方言文献还有可挖掘的空间。考虑到西洋传教士在描写语言学方面的优长,如果能够发掘出这些作品,对闽东北片方音史的研究将会有重要意义。

(二)方言调查的深入

20世纪80年代,学界还以是否存在变韵现象作为闽东方言南片与北片的分区标准,但是陈泽平、叶太清、戴黎刚、陈丽冰等人的研究揭示了北片区不仅存在变韵而且较南片更为丰富这一事实,对闽语的分区提供了新材料并提出了新挑战。福安话半元音声母的由来,戴黎刚也是在考察福鼎、柘荣等方言点的读音之后得出了全新解释,将其归结为闽南话对福安话的影响,而非学界此前认为的吴语温州话带来的影响。

正如秋谷裕幸先生所言,整个闽语区,闽东北片方言的调查是比较薄弱的。然而每当调查深入时,总会有许多惊喜等待我们。目前看来,福鼎的地理位置极其特殊,既处于闽东与浙南的接触前沿又深受闽南话影响,已出的研究成果显示,福鼎话与闽东北片其他方言差别较大,正值得进一步研究。至于

柘荣、周宁两县,目前的研究成果非常稀少,其语音面貌正待学界同仁去揭示。

(三)方言接触研究的深化

汉语方言在形成、演变的过程中不仅受到共同语的影响,而且还与邻近语言或方言产生交互,彼此以某种层次的形式渗透进对方。因此,邻近方言的比较是我们观察语言事实,抽绎演变线索,了解演变规律的重要手段。

闽东方言北片区与吴语瓯江片毗邻,是吴语与闽语接触的前沿。闽东方言、闽南方言(闽东区)、浙南方言从南向北次第展开,形成了闽东地区复杂的语言地貌。而且,吴语区丰富的儒生文献以及传教士文献可以帮助我们观察不同历史平面的音系,从而推测吴、闽语一百多年来的演化方式及相互影响。通过对两种方言百年演化史的动态比较,我们也许可以进一步推测时间跨度更长的吴、闽语演化的规律与方向。这对吴语与闽语的接触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

(四)方言外部研究的加强

闽东方言北片区有着丰富的民俗文化形式,其中戏曲、渔歌等形式可以作为方音研究的重要材料,而我们的方言研究也能对于这些民俗文化形式的保存与发扬提供支持。曹志耘《汉语方言研究的愿景》指出,汉语方言的研究在纯粹的学理研究之外,应该重

视应用问题,更多关注方言与文化的关系。^[12]据此,将闽东北片方言的研究与当地戏曲等多种民俗文化形式相结合,也许是打开闽东北片方音研究新局面的途径之一。

参考文献:

- [1]吴珊珊.《安腔戚林八音》老本、抄本声韵系统比较研究[J].贵州工程应用技术学院学报,2017(6).
- [2]吴珊珊,马重奇.《戚林八音福安地方方言版》残卷与《安腔八音》手抄本韵部比较研究[J].东南学术,2012(1).
- [3](日)秋谷裕幸.《班华字典—福安方言》音系初探[J].方言,2012(1).
- [4]钟逢帮.闽东方言北片音韵研究[D].广西大学,2003.
- [5]叶太青.闽东北片方言语音研究[D].福建师范大学,2007.
- [6]梁玉璋.福安方言概述[J].福建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3).
- [7]戴黎刚.闽东福安话的变韵[J].中国语文,2008(3).
- [8]陈泽平.福安话韵母的历史音变及其共时分析方法[J].中国语文,2012(1).
- [9]陈泽平.闽东福安话半元音声母的由来[J].中国语文,2014(3).
- [10]戴黎刚.福建福安话零声母自由变体的音位化历程[J].方言,2018(1).
- [11]陈丽冰.福建宁德蕉城方言声母类化规律及其制约因素[J].方言,2014(1).
- [12]曹志耘.汉语方言研究的愿景[J].语言教学与研究,2012(5).

责任编辑 韩玺吾 E-mail:shekeban@163.com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of Phonetic Research on the Northern Area of Eastern Fujian Dialect

Ren Xiangyu

(School of Language and Culture, Ningde Normal University, Ningde 352000, Fujian)

Abstract: The literature of four historical dialects in northern area of eastern Fujian dialect has recorded many phenomena since the middle of the 18th century, such as the phonetic condition of fu'an dialect, the production of the semivowels, the mixture of consonant endings, the existence of Cuo Kouhu(with y as the vowel or head vowel), vowel variation, etc., from which the clues can be found. With the deepening of the investigation and research of dialect, the phenomena of initial consonant assimilation and vowel variation in the northern area of eastern Fujian dialect have become hot topics in the academic circle. However,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historical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of modern phonology has given a reasonable explanation to the complicated phenomena of phonetic changes. The future phonetic research needs to dig deeply into the historical corpus, make a more detailed investigation of the living language, and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complicated dialectal contact in the northern area of eastern Fujian dialect. In addition, it is one of the ways to expand the research field of phonetics in the northern area of eastern Fujian dialect by combining dialects with operas and other folk cultural forms.

Key words: eastern Fujian dialect; the northern area; phonetic research; status quo; prospect